



辛亥革命前后
的中英经济关系
(1895—1915年)

胡成 著

著者有出版權
廣東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后
的中英经济关系

(1895—1915年)

胡波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1895—1915年 / 胡波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18-08033-8

I. ①辛… II. ①胡… III. ①中英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研究—1895—1915
IV. ①F1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840号

XINHAIGEMING QIANHOU DE ZHONGYINGJINGJIGUANXI: 1895—1915 NIAN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1895—1915年

胡 波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张贤明 柏 峰

装帧设计：盛世华彩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深圳市鸿赞安福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8033-8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00千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前言 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一、历史的反思与问题的提出

过去，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不是偏重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详细陈述，就是着意于对中外关系史的简单描写；不是片面地强调先进与落后，就是单纯地肯定积极和进步；不是高调地坚持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是固执地维护侵略与反侵略之辩，他们较少把注意力放在应该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的历史问题上，以为如实地陈述了历史事件，客观地剖析了历史现象，公正地判明了是非曲直，就该到此打住，满意收兵。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他们一再强调他们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2]的，也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把人类历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3]，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的倡导者们认为：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页。

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也就是说，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必然要以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己任。理论的探索，哲学的沉思，文化的反省，历史的辨析，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学过中外关系史的人也许有过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曾经是世界文明的火炬，光被四野的华夏之邦，到了近代却被动挨打，一落千丈？在早期的中西关系中，郑和七下西洋不曾带来中国社会的变动，而《马可·波罗游记》却撩起了西方社会向往东方的利欲之火？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纷至沓来，引起了日本岛国的强烈反响，却没有引起当时中国社会朝野人士的高度关注？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却成为西方社会变革的力量？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是历史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社会的原因，还有的认为是文化的原因。但是，他们这些看法大都忽视了主宰世界并在改造世界中演出一幕幕悲喜剧来的有意识、有思想的人的作用与影响，更轻看了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文化特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早期中西关系史上的战争与和平，封闭与开放，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吸收与抗拒，同化与异化，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人们心理上的外在反映，而研究这种心理上的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着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兴趣和行动，了解它们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就显得很有必要。早在16世纪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第一次碰撞时，中国朝野上下的非正常反应，虽然没有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和正确对待，但是，西方世界却产生

了连锁反应，甚至直接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后，为了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他所在的国家与中华帝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彼此相隔的距离，特意拿出他从西方带来的世界地图。但当中国人从利玛窦带来的地图上看到中华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是在最东的边缘时，不禁迷惑不解甚至感到莫名地恐惧和惊讶。利玛窦甚至发现：“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美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了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1]“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不大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断。”^[2]

为什么会出现利玛窦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心理定势的负效应。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长期教条式地搬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或受单一化、模式化的影响，片面化、静止地认识事物，势必形成一种心理定势的负效应，以后每遇到相近、相似或相关的刺激，都会引起一种自动性的定向反射，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地运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自然思维。上例在今天看来之所以如此好

[1]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

[2]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页。

笑，主要是他们运用了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如同利玛窦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指西方人）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1]这种在思考问题时片面地、错误地运用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采用了非科学的思维方法，正是民族心理定势的负效应所导致的结果。

这种心理定势的负效应产生的另一种后果则是从自大到自卑。利玛窦在与中国人交往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美。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2]虽然利玛窦等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性格的观察和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上的偏见和认识上的局限，但他们的看法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部分实情。透过《利玛窦中国札记》和早期西方传教士、游历者关于中国的记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回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

[1]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页。

[2]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二、中华民族心理定势的历史透视

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的四大发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接近尾声之际，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方兴未艾、繁荣昌盛之时。然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传统文化的不断赓续，却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而缺少了相互比较的对象，以致人为地将中华文明自诩为世界文明的唯一代表，文化的优越感因此也在人们的心理和整个民族的意识中潜滋暗长。四方邻国的朝贡，遥远国度的羡慕，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应运而生。^[1]当时中国人的心灵就是：中华文明，始终高出于邻国他邦之上。这种心理和认识上的固化，从而使中国人傲睨万物、自尊自大，过分地珍视固有的文明，却不思革新进取；一味地坚持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而不去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就是见了好的事物，也不想学，更不愿意学，缺乏“见贤思齐”的品德，陶醉在中华文明的“优越论”之中。这种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抱残守厥的心态，在历史长河之中，逐渐积淀出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民族心理定势，产生民族心理定势的负效应。

中华民族这种心理定势，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强化，并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这种民族心理定势对早期中西关系的发展到底有何影响？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对当时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进行一次全面的透视。在审视历史，观察社会，反省文化，探究人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心理定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心理定势一：天圆地方，中国中心观的强化。

天圆地方，以华夏为中心的古代天文地理知识的强化，使中国人对世界缺乏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中心观。认识的心理定型，其表现正如利玛窦等人所了解到的：“中国的天

[1]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0页。

文学和航海学家们始终未能超脱人类原始的粗糙观念，总认为地球是一块平面。他们认为中国位置在这块平面的中心，因此他们自称‘中华’，其他各国，在他们的眼光中都比较小，而且远处在地球的边沿，再往远去就是深渊和太空了。”^[1]的确，当时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也正因为有这种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利玛窦带来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

这种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代代相传，岁岁灌输，年深日久，逐渐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模式化的、僵硬化的观念，并成为他们观察和分析周边世界的原则与方法。“据说中国政府还根据某些欧洲传教士的意见，按荷兰在地图上的面积大小而确定它的政治重要性。……此外，中国政府还按各国使节迁就中国的妄自尊大的种种要求的不同程度来确定这些国家的重要性。”^[2]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世界就是像他们前辈所描述的那样大小，在中国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洞天福地、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对世界的探索，对宇宙的穷究，也没有什么必要，生存空间仅此而已，于是他们只求整个心灵和肉体与浑一自然同生同在，以适应宇宙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之规律。

心理定势二：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心理定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其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和朝代更替之中，一再证实了它的特殊效用，因而在人们心中产生了不可泯灭的自豪感。

[1]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2]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连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它使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优越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这种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也使每一个个体拥有了民族文化的自信。但是，这种民族文化优越感，在朝代更替中久经考验，逐渐形成一种惯性，变成整个民族的一种心理定势。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知识阶层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的确，以“天朝大国”自居的臣民，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常用“番”、“夷”、“蛮”等这种带有鄙视和贬抑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籍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外国人，他们也会认为外国人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1]

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充满优越感往往表现在，总是喜欢用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安排他们的事物，厘定关系亲疏的界限。他们认为，雄踞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外围“蛮夷”与中国皇帝只能保持藩属关系，不管地理距离有多远，都得臣属于皇帝并定期向中国皇帝称臣进贡。自秦汉特别是唐宋以来，“朝贡”一词逐渐被中国朝野所确认，以致它既可用于与蛮族的外交关系，也可用于与它们的贸易往来。而中国在隋、唐、宋、元、明和清前期的强大与繁荣，皇帝的恩泽遍及四方，这些表象恰恰给中国的优越和非中国人的隶属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有的学者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因为中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很早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其地区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外族王公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

[1]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95页。

[2]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现代学者称这套由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为‘朝贡体系’。”^[1]

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总是按照传统的“纳贡称臣”、“臣属皇上”的心理习惯来看待，诚如传教士们所言：“中国王朝固守着自己的方针，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的天堂，不愿意同外国打交道，不愿意自己的臣民同外国人有来往。”^[2]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国人的行动中。“任何其他国家的一些在中国方面引起警觉来假期限制所有在华的欧洲人，借以避免使其在中国人当中发生不良的影响。”^[3]甚至宣称：“允许外人通商并不是为了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这样是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所教导的人道主义的。”^[4]

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定势，以致使外国人都可以想象到这样的情形，即中国人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极大的疑惧了。^[5]在中国，所有人间的优点和美德被认为都集于皇帝一人之身。中国广大臣民的心目中，除了皇帝之外，世界上所有其余的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似乎都无足轻重。他们认为，皇帝的统治遍及全世界，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习惯性的观念之下，他们对皇帝的臣服关系因此是毫无际限的，而他们认为外国或外国人同他们的皇帝的关系，实际上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都是

[1]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4]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5]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

皇帝或天子脚下的臣民。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宾免于他们在中国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不被允许了解的东西。中国的皇帝自然是见不到的，因为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交予钦差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地理条件的特殊性而生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必然导致自尊自大、故步自封，也必然导致闭目塞听、盲目排外。他们这种心理，一旦发现“天朝礼仪之邦”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大千世界，自然有些惊慌失措。惊愕之余而生疑惑，疑惑被否定之后，便是抗拒或一味的艳羡，民族的优越感最后却一变而成民族自卑感。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其妄自尊大的虚骄心理一变而为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就是对这种民族心理定势的最恰当的诠释。

心理定势三：“夷夏之防”观念的根深蒂固。

中国历史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血缘氏族制度的历史非常漫长，而且发展得特别完备。它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又持久的影响。农村里聚族而居，完全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乡一个姓，长辈晚辈分得清清楚楚，家族、邻里、朋友、亲戚，分得明明白白。尊长爱幼，谦虚礼让，和睦邻里，守望相助，这种传统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则，就成为非常顽固的东西。儒家把古代这种家族制度意识形态化后，浓缩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家族意识和“夷夏之防”观念的同生共存。中国儒家的杰出代表们老讲“夷夏之防”，对内大讲特讲“仁爱”和“互助”，对外却一反常态地宣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片面地强调抵御外侮，忽视了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团结合作。^[1]更有意思的

[1] 参阅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

是，儒家这一思想，后来竟逐渐积淀，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魏晋时的儒、佛、道三教展开的“华夷之辨”，到明清时期强调的“夷夏之防”，从历史上所指的“五胡乱中华”，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蛮夷入侵”，“夷夏之防”的观念在传统社会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中，民族危机的威胁，更使这种历史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演化为一种畸形的民族心理定势。到了明清之际，这种心理定势因倭寇的骚扰和葡萄牙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而变得更加严重。16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士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企图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拒之于中国国门之外，死在广东的上川岛。稍后的利玛窦和他的伙伴，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也曾备受敌视，并多次遭到暴力的攻击。而且“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顾按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国家的内地”。^[2] “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们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3] “如果一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他不会被处死或被迫做奴隶，但他将不准离开中国，免得他在外面煽起损害中国政府的骚动。因此，对于未得皇上亲自批准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将严加‘惩处’。”^[4]

总之，中国人对外来民族一贯抱着怀疑、警惕和谨慎的态度，他们以一种陌生和疑惧的眼光，审视一切外来民族。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对于外国使节仅视为在国家重大节日送礼而来，节日过后即刻归国。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外国使节到过中国，没有一个超过马嘎尔尼使团在中

[1]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月。

[2]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3]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4]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国勾留时间期限的。葡萄牙是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乾隆皇帝统治下，葡萄牙曾派特使前来，最多只住了39天就走了，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1]同时，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2]当然，这些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

心理定势四：“求同存异”的原则坚守。

从《易经》开始的天地人融为一体“天人合一”观念，到秦汉时期逐渐演变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汉代董仲舒曾富有创造性地把天人、古今、自然、社会、物质、精神等现象统统组合到一个大系统里。而且这个系统已不同于孔孟时代是从氏族血缘出发，而是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出发，其目的是为了稳固和保持这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动态平衡，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统治目的。我们经常讲汉族、汉人、汉语等，表明汉代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奠定了基础。这个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稳定，对外部特别注意，要求其能够有效地适应环境。在大一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形成了一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对待外来的东西时，首先注意与自己的相同之处，模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地方，然后按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将其进一步吸收、消化，使之为我所用为我所有。

这个系统的秩序性和封闭性，使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在系统中被规定被安顿，君应该如何，臣应该怎样，都有既定的规矩和法则，任何人都不能越出特定的规矩和范围。而且这种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社会和积习相沿的制度与文化特性，在“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

[1]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2]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双重变奏中逐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信念。

在对外关系上，生活在古代华北平原的人们，曾经做了许多尝试来对付那些可能从长城外面的草原入侵的外族骑兵。当足够强大时，他们能够征服入侵者或把入侵者逐出中国领土。当不够强大时，中国人就与入侵者断绝往来，或者给他们粮食、丝绸，甚至用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和平。当国家衰弱时，人数众多的中国人仍然能够同化人数很少的蛮夷入侵者。但是事实上，这种外交策略或手段很难长久地与周边地区的民族、国家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前后汉如此，隋唐亦是如此，元朝如此，明清更是如此。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求同存异”是与异质文化和他族和平共处的生存法宝。中华文化经常同化外来民族文化，却很少被外来民族文化所同化，这既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又暴露了中华文化的保守性。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系统功能的有效性，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求同存异”心理定势的形成。

心理定势五：“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思想文化的僵化。

从孔孟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说教，到程朱三纲五常的纲常伦理，从汉唐儒家的重义轻利，到宋元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封建文人学士的大力鼓吹，少数人物的身体力行，逐渐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形成一种固定性的心理反应，产生了一种与西方人道主义完全不同的中国式人道主义。

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出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要求从中世纪神权、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而中国的人道主义讲的是人们互相友爱合作、互相帮助。儒家许多思想主张如“父母在，不远游”，“不患寡而患不均”，“和为贵”等，都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巩固宗族团结，并不提倡个人突出和向外发展。^[1]

同时，中国的哲学家们偏重于理想的追求，忽视现实生活。孔子对

[1]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月。

“仁”的追求，墨子对“兼爱”的强调，老子对“无为”的坚守，荀子对“有为”的企想，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注重内心修养，轻视外物；崇尚天道，轻视人为；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强调理性而贬抑欲望。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教导应如何孝顺，但对父辈应如何仁慈则委之自然本性。然而，自然本性的支配远远抵不上长期的箴规格言的效力。“存天理，灭人欲”等儒家思想观念，在漫长历史积淀下，形成了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统觉”或心理定势。

这种统觉或心理定势，使人们在与西方人接触过程中，总喜欢用自己的心理习惯或现实生活的体验去审视去判断去选择。一位英国使臣就说过：“我们独往独来和自由行动的精神……在中国的骄傲武断的官员们看来往往认为是放肆，特别是这些行动出之于从事商业的人，而商业在中国被认为是最低级的行业。最坏的情况是英国的水手和低级人员往往滥用自由作出一些不规则的、放纵的事情，这在生活严肃的中国人看来更属不能容忍的了。”^[1]甚至也有这样的传说，当这些铜白炮在皇帝（中国乾隆帝）面前试演时，他是赞美这些有破坏性的引擎的技术和技巧；但是他反对那种运用这些铜白炮的民族精神，他对这种破坏性利器的进步同他们所崇尚的以仁慈为怀的宗教原则不能调和。这种心理状态使外国人难以与中国人接近，外国的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应用。原则和规范的不同，心理习惯的隔阂，东西方因此就谈不上彼此之间的全面了解和相互交流了。

其次，儒家的道德规范也对人们的心理发生着特殊的作用。“父母在，不远游”等规范的固滞，以致“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去送死无疑一样”。^[2]“除了少数住在

[1]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2]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沿海铤而走险的人，或者以航海为业的自成一个阶层的人以外，没有人想离开中国到别的国去看看”^[2]这固然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恋土思乡之情的影响，但也有儒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对君臣对父母行孝行忠的忠孝观念的作用。

总之，由于世代相传，活着的人总强烈地感到祖先的影响仍然在他们的周围，这使他们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此外，由于他们不是从目前的狭隘利益出发，而是联系到自己的品德和行动将由后代子孙传递下去，自己的行动因此也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社会复杂的关系网中，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民族的道德原则和心理习惯去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原则和言行举止，从而作出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民族心理定势与早期中西关系

对明清之际的民族心理定势作了一次粗略的透视之后，便会发现，中华民族的这种心理定势，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上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上，思想文化交流的曲曲折折，科学技术传播的步履蹒跚，国家民族相互交往的坎坷经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族心理定势的影响和制约，而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又导致了民族心理定势的负效应的产生。

心理定势负效应一：拒绝对世界进行探索与了解，缺乏探险精神。

由于民族心理定势，所以在对世界的认知上，中国人仍然严守着古代天文地理知识和自然观念，奉古人的陈见为金科玉律，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想到在中国之外还有更为广大的世界，更没有进行地理探险和科技发明的欲望。虽然有唐僧去西天取经所历十八国的神话传奇，以及

[1]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